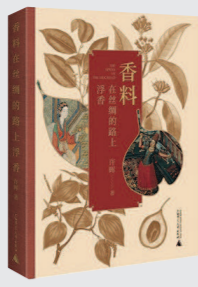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推荐



本书是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·沃森探究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新锐作品。他汲取了最近的人类学、考古学等成果,论述了人性在不同环境中所实现的不同潜能,也呈现出新旧大陆人类社会殊途同归的宏大图景。

《大分离:新旧大陆的命运》
[英]彼得·沃森 著
孙艳萍 译
译林出版社
2023年5月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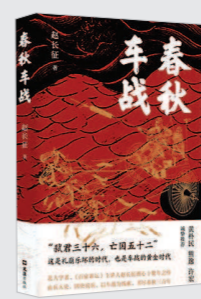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选取经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14种香料,详解它们的“旅行”足迹、多样变迁以及在不同文化谱系中的象征意义;同时在一幅幅中西对照的历史名画中一睹香料的无穷魅力。

《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》
许晖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3年3月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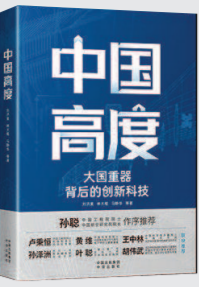
一些昆虫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迷人的社会生活形式和集体智慧。人类社会的许多形态迫使我们自发的拟人化提出质疑。昆虫世界离我们很遥远,却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和环境观念。

《昆虫哲学》
[法]让-马克·德鲁安 著
郑理 译
上海文艺出版社
2023年3月出版



华夏文明裂变新生的年代,战车是战场的主角,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都与车战有关。本书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经典史料为纲,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,一窥车兵兴衰全过程。

《春秋车战》
赵长征 著
文汇出版社
2023年6月出版



本书以中国自主研发的多型高科技产品为线索,回顾总结近年来中国航空事业的突出成就,展现大国重器背后的创新科技;集结35位科学家、工程师等航空专业人士的科研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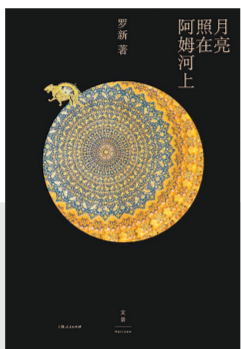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高度》
刘济美 林大楷
马静华 等著
中译出版社
2023年6月出版

书人茶话

行走的学者,让历史“动起来”

唐之诒

历史是鲜活的,文字和书本只是历史信息的载体之一,纸面之外,历史学尚有广袤空间。历史学家只有更多地走出去,才能更好地走入历史。历史爱好者也有必要“动起来”,增进对历史和环境的认知。这是最近阅读的三本书——罗新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、侯杨方的《这才是丝绸之路》和韩茂莉的《大地中国》给我带来的最迫切的感受。



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
罗新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这才是丝绸之路》
侯杨方 著
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


《大地中国》
韩茂莉 著
文汇出版社出版

效法司马迁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原是古人对读书人的期许。这期许里蕴含大智慧:如果知识只从纸上得来,又用纸和笔创造,极容易和鲜活的生命脱节。这样的知识乃无用之学,甚至是披着华丽外衣的“伪知识”。读书人必须走出书斋,在行走中让知识与现实相映照、相激荡,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。

历史学家就更应如此了。当然我知道,很多人对历史学家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埋首故纸堆,从前人的字里行间费尽心机地寻绎真相。恰好,中国又是史学大国,史官文化源远流长,仅正史就有煌煌二十五部(二十五史),私家野史、笔记掌故更是不计其数。这文字构成的浩瀚大洋,足够人徜徉几辈子,书都读不完,遑论走出去?但我们恐怕不能这样看问题。历史记录的是一过去的人和事,而人事之幽微、复杂,稍具阅历者即有体会。那么,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,何以洞察人性之幽微,揭示世事之复杂呢?

对此,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是有着深刻认知并积极“破局”的,所以从20岁起,他就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壮游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为我们描绘了自己的壮游图:“二十而南游江、淮,上会稽,探禹穴,窥九疑,浮于沅、湘,北涉汶、泗,讲业齐、鲁之都,观孔子之遗风,射乡邹、鲁,厄困郢、彭城,过梁、楚而归。”

那是没有飞机高铁汽车的年代,旅途艰辛可想而知。司马迁却乐此不疲,用脚步丈量山河,用见闻开拓视野,方才成就了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的《史记》。千百年来,《史记》始终牢牢占据中国史学的“头把交椅”,除了写得早,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知人论世的功力独步千古。而这,就是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。

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。《史记》之后的正史,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,正史矣,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。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。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,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,并要求学者遵守。这原本没错,可一旦走向极致,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“学术规范”之中。长期规训之下,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,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、讲给同行听,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、“茶杯里的风暴”,与历史本体无关,更与大众无关。

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。2002年他接替老师、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,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。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,李开元却内心不安: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,论文里充斥着数据、材料、图表、概念,像是逻辑游戏。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,感觉离“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”越远。

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,提出“打通文史哲,效法司马迁”。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,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。多年磨砺后,李开元推出了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汉兴》,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。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,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、垓下古战场,只要有可能,他都亲自考察,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。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。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。

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

令人欣喜的是,李开元并不孤独。事实上,这几年有越来越多“行走的历史学家”为公众所知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,人称“当代徐霞客”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,他有一句名言:“认识中国,不仅要读书,也要行路。”《我们的中国》丛书,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,书分四册:《茫茫禹迹》《周行天下》《大地文章》《思想地图》,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及思想史遗迹。

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,同样是“资深驴友”,经常作长途漫游。2017年,他从北京(元大都)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(元上都),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驛路。之后的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,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“破圈”,广受关注。

2022年末,罗新又出版了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。书如其名,本书所录十篇文章,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。罗新观察细致,文笔流畅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尤其是用作书名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一文,以阿姆河为线索,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

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。

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。《史记》之后的正史,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,正史矣,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。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。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,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,并要求学者遵守。这原本没错,可一旦走向极致,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“学术规范”之中。长期规训之下,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,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、讲给同行听,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、“茶杯里的风暴”,与历史本体无关,更与大众无关。

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。2002年他接替老师、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,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。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,李开元却内心不安: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,论文里充斥着数据、材料、图表、概念,像是逻辑游戏。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,感觉离“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”越远。

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,提出“打通文史哲,效法司马迁”。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,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。多年磨砺后,李开元推出了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汉兴》,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。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,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、垓下古战场,只要有可能,他都亲自考察,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。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。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。

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

令人欣喜的是,李开元并不孤独。事实上,这几年有越来越多“行走的历史学家”为公众所知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,人称“当代徐霞客”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,他有一句名言:“认识中国,不仅要读书,也要行路。”《我们的中国》丛书,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,书分四册:《茫茫禹迹》《周行天下》《大地文章》《思想地图》,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及思想史遗迹。

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,同样是“资深驴友”,经常作长途漫游。2017年,他从北京(元大都)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(元上都),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驛路。之后的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,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“破圈”,广受关注。

2022年末,罗新又出版了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。书如其名,本书所录十篇文章,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。罗新观察细致,文笔流畅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尤其是用作书名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一文,以阿姆河为线索,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

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。

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。《史记》之后的正史,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,正史矣,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。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。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,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,并要求学者遵守。这原本没错,可一旦走向极致,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“学术规范”之中。长期规训之下,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,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、讲给同行听,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、“茶杯里的风暴”,与历史本体无关,更与大众无关。

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。2002年他接替老师、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,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。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,李开元却内心不安: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,论文里充斥着数据、材料、图表、概念,像是逻辑游戏。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,感觉离“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”越远。

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,提出“打通文史哲,效法司马迁”。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,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。多年磨砺后,李开元推出了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汉兴》,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。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,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、垓下古战场,只要有可能,他都亲自考察,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。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。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。

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

令人欣喜的是,李开元并不孤独。事实上,这几年有越来越多“行走的历史学家”为公众所知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,人称“当代徐霞客”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,他有一句名言:“认识中国,不仅要读书,也要行路。”《我们的中国》丛书,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,书分四册:《茫茫禹迹》《周行天下》《大地文章》《思想地图》,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及思想史遗迹。

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,同样是“资深驴友”,经常作长途漫游。2017年,他从北京(元大都)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(元上都),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驛路。之后的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,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“破圈”,广受关注。

2022年末,罗新又出版了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。书如其名,本书所录十篇文章,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。罗新观察细致,文笔流畅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尤其是用作书名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一文,以阿姆河为线索,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



《大地中国》
韩茂莉 著
文汇出版社出版

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。

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。《史记》之后的正史,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,正史矣,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。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。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,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,并要求学者遵守。这原本没错,可一旦走向极致,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“学术规范”之中。长期规训之下,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,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、讲给同行听,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、“茶杯里的风暴”,与历史本体无关,更与大众无关。

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。2002年他接替老师、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,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。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,李开元却内心不安: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,论文里充斥着数据、材料、图表、概念,像是逻辑游戏。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,感觉离“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”越远。

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,提出“打通文史哲,效法司马迁”。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,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。多年磨砺后,李开元推出了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汉兴》,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。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,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、垓下古战场,只要有可能,他都亲自考察,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。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。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。

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

令人欣喜的是,李开元并不孤独。事实上,这几年有越来越多“行走的历史学家”为公众所知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,人称“当代徐霞客”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,他有一句名言:“认识中国,不仅要读书,也要行路。”《我们的中国》丛书,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,书分四册:《茫茫禹迹》《周行天下》《大地文章》《思想地图》,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及思想史遗迹。

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,同样是“资深驴友”,经常作长途漫游。2017年,他从北京(元大都)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(元上都),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驛路。之后的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,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“破圈”,广受关注。

2022年末,罗新又出版了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。书如其名,本书所录十篇文章,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。罗新观察细致,文笔流畅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尤其是用作书名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一文,以阿姆河为线索,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

《昆虫哲学》
[法]让-马克·德鲁安 著
郑理 译
上海文艺出版社
2023年3月出版

一些昆虫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迷人的社会生活形式和集体智慧。人类社会的许多形态迫使我们自发的拟人化提出质疑。昆虫世界离我们很遥远,却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和环境观念。

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。

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。《史记》之后的正史,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,正史矣,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。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。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,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,并要求学者遵守。这原本没错,可一旦走向极致,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“学术规范”之中。长期规训之下,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,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、讲给同行听,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、“茶杯里的风暴”,与历史本体无关,更与大众无关。

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。2002年他接替老师、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,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。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,李开元却内心不安: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,论文里充斥着数据、材料、图表、概念,像是逻辑游戏。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,感觉离“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”越远。

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,提出“打通文史哲,效法司马迁”。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,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。多年磨砺后,李开元推出了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汉兴》,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。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,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、垓下古战场,只要有可能,他都亲自考察,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。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。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。

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

令人欣喜的是,李开元并不孤独。事实上,这几年有越来越多“行走的历史学家”为公众所知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,人称“当代徐霞客”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,他有一句名言:“认识中国,不仅要读书,也要行路。”《我们的中国》丛书,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,书分四册:《茫茫禹迹》《周行天下》《大地文章》《思想地图》,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及思想史遗迹。

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,同样是“资深驴友”,经常作长途漫游。2017年,他从北京(元大都)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(元上都),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驛路。之后的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,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“破圈”,广受关注。

2022年末,罗新又出版了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。书如其名,本书所录十篇文章,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。罗新观察细致,文笔流畅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尤其是用作书名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一文,以阿姆河为线索,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

《春秋车战》
赵长征 著
文汇出版社
2023年6月出版

华夏文明裂变新生的年代,战车是战场的主角,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都与车战有关。本书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经典史料为纲,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,一窥车兵兴衰全过程。

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。

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。《史记》之后的正史,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,正史矣,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。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。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,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,并要求学者遵守。这原本没错,可一旦走向极致,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“学术规范”之中。长期规训之下,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,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、讲给同行听,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、“茶杯里的风暴”,与历史本体无关,更与大众无关。

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。2002年他接替老师、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,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。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,李开元却内心不安: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,论文里充斥着数据、材料、图表、概念,像是逻辑游戏。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,感觉离“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”越远。

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,提出“打通文史哲,效法司马迁”。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,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。多年磨砺后,李开元推出了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汉兴》,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。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,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、垓下古战场,只要有可能,他都亲自考察,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。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。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。

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

令人欣喜的是,李开元并不孤独。事实上,这几年有越来越多“行走的历史学家”为公众所知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,人称“当代徐霞客”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,他有一句名言:“认识中国,不仅要读书,也要行路。”《我们的中国》丛书,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,书分四册:《茫茫禹迹》《周行天下》《大地文章》《思想地图》,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及思想史遗迹。

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,同样是“资深驴友”,经常作长途漫游。2017年,他从北京(元大都)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(元上都),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驛路。之后的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,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“破圈”,广受关注。

2022年末,罗新又出版了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。书如其名,本书所录十篇文章,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。罗新观察细致,文笔流畅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尤其是用作书名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一文,以阿姆河为线索,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

《中国高度》
刘济美 林大楷
马静华 等著
中译出版社
2023年6月出版

本书以中国自主研发的多型高科技产品为线索,回顾总结近年来中国航空事业的突出成就,展现大国重器背后的创新科技;集结35位科学家、工程师等航空专业人士的科研成果。

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。

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。《史记》之后的正史,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,正史矣,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。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。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,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,并要求学者遵守。这原本没错,可一旦走向极致,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“学术规范”之中。长期规训之下,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,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、讲给同行听,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、“茶杯里的风暴”,与历史本体无关,更与大众无关。

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。2002年他接替老师、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,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。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,李开元却内心不安: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,论文里充斥着数据、材料、图表、概念,像是逻辑游戏。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,感觉离“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”越远。

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,提出“打通文史哲,效法司马迁”。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,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。多年磨砺后,李开元推出了《秦崩》《楚亡》《汉兴》,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。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,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、垓下古战场,只要有可能,他都亲自考察,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。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。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。

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

令人欣喜的是,李开元并不孤独。事实上,这几年有越来越多“行走的历史学家”为公众所知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,人称“当代徐霞客”,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,他有一句名言:“认识中国,不仅要读书,也要行路。”《我们的中国》丛书,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,书分四册:《茫茫禹迹》《周行天下》《大地文章》《思想地图》,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、战场、祭祀及思想史遗迹。

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,同样是“资深驴友”,经常作长途漫游。2017年,他从北京(元大都)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(元上都),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驛路。之后的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,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“破圈”,广受关注。

2022年末,罗新又出版了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。书如其名,本书所录十篇文章,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。罗新观察细致,文笔流畅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尤其是用作书名的《月亮照在阿姆河上》一文,以阿姆河为线索,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

文化寻踪

宇宙视野里的人类自省

戴荣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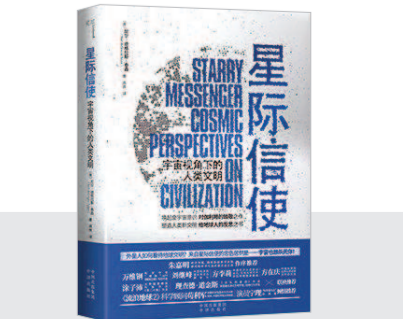
《星际信使: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》是由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尼尔·德格拉斯·泰森创作的一本思考世界本来面目的书,这本书告诉读者来自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。作者跳出普通人的思维,调用其近30年天文馆馆长的思考积累和长期的科普经验,为读者提供了一场思想的洗礼,好像听到了宇宙深处深藏着的对人类调侃的声音。

人类从认知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路径中,逐渐培养起自高自大的习气。然而,地球在浩瀚宇宙中不过是尘埃般的存在,生活在地球的人类,以自己对外界认知的浅薄价值现在改造着世界。而当人类以宇宙视野审视地球时,会忽然发现生命原本如此脆弱和卑微。人类应该跳出自身惯常的视野,以更宏大的背景作为生存的前提,从更宏大的叙事里,明白人类自圆其说的逻辑的不足。

本书作者是具有高度理性的天体物理学家,在其提供的星际信使从天外采访地球的经历中,用宇宙视角将人类文明重新定位。在作者的宇宙视野里,理性、证据、尺度、分歧、共性、自然之美、外星人、概率、科学……这些关键词得到更深意义的引申。作者运用其看家本领,将宇宙天体的科普知识运用自如,提醒人类为认知上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和“地球中心主义”“错误”,将人类越来越科学其实越来越遮蔽的美好认知重新擦拭光亮。在与科学与社会哲学的探索中,作者将生活与宇宙美学做了对比,寻找探索与发现对塑造生命的价值贡献。书中提到,地球与月亮,是宇宙共同体里的连体姊妹,拥有同一种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星球;而在时空分割的颜色与种族的差异里,人类更应该寻找那些藏匿于人体深处的相似点。正因为性别和种族的差异未必那么无可逾越,建立宇宙视野下的法律和秩序才有了更多可能性和有效性。人类应从更宏观、高远、全面的视野,跳出人类自身现有生理学的认知,重新找到身体与意识的密切关系,理解人类自身的生命和死亡,这样才能重回人类原初世界的美好。正像作者所强调的那样,将此书“献给所有希望看到世界本来面目,而不是现在面目的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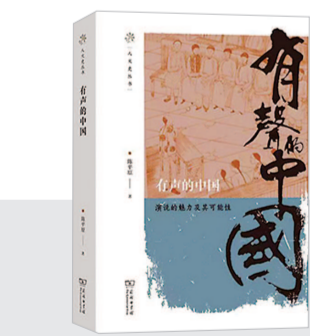
宇宙视角提供了人类“既无处可去,又无处不在”的无限可能性。作者不止一次提出,被人类视作无比伟大的地球,只不过是孤立宇宙中的一粒微尘,人类要活在当下,珍惜当下,“活着本身就是一场庆典,每一个清醒的时刻都值得庆祝”。作者还不止一次地提醒,科技容易让人类骄傲,倘若更有更大尺度的宇宙视角,人类才会变得更加谦卑,才会放下身边小尺度的争端。这正是作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。

人类发展到今天,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,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类的认知,凭借高科技的发展,人类或许正进入自我膨胀期。《星际信使》这部书的洞察力,来自于科学家的真知灼见,又超越科学家的传统思维。作者告诉我们,认知自然的本真面目,让人类游荡在大宇宙之中,方能获得更多有益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元素。



《星际信使: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》
[美]尼尔·德格拉斯·泰森 著
高爽 译
中译出版社出版

三味书屋



《有声的中国——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》
陈平原 著
商务印书馆出版

诸君:要知道,我们陈平原先生对声音的兴趣,总也有超过20年了。他那篇著名的《有声的中国——“演说”与近现代中国文字变革》是在2005年首次在学术会议宣读的。其实还要更早,2000年陈平原先生为贵州教育出版社主编《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丛书》,在《点石斋画报选》之后,即继之以《章太炎白话文》。到了2005年,他带着一班学生分头编写“现代学者演说现场”丛书,其对于现代中国研究的“四重视野”当已定型:大学、都市、图像与声音。

说起来,“声音”是四者之中最难研究的。当年编“现代学者演说现场”丛书,我分到的现代学者是胡适——这人极有名,留存史料亦多,按说比别个要容易叙述。但是样章写了,目录拟了,真要做起来,也是为难得算。编《演说集》不难,无非是全集里挑挑捡捡,但想要达到“还原现场”的地步,立时觉得天地苍茫,无枝可依。加上博士论文答辩、找工作等等干扰,最终竟不能还著

《有声的中国——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》
陈平原 著
商务印书馆出版

一百年来,我们听见的中国

杨早

第二章《晚清画报中的声音》其实是放大了“视觉呈现”,将作者关注的“图像”与“声音”勾连起来。这一章配的插图既多且妙,而且也不限于演说,举凡乐队、剧场、会议,晚清画报中出现的声音类型,纷纷跃然纸上。特殊演说者如小学生、和尚、道士演说的画面场景,特别能呈现晚清社会“众声喧哗”的特性。在一场演说里,这就是列数据、举例子的部分,丰富又有趣,观众自然舍不得离场。

第三章《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》,干货来了!作者过目的近代以“演说学”为主题的书籍多达56种。这些书籍或译或著,精粗不一,详略参差,但汇集起来,就很好地展示了现代中国人是如何追求演说的才能,以及什么样的演说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演说。同样,名人演讲集的盛行,也让人看到民众对“声音”(哪怕是拟想的)的迷恋。诸君,我突然想到,将中国古已有之的“语录”与20世纪的“演说”进行细析比较,怕不也是很好的跨学科题目?

第四章《声音的政治与美学》是最好看的,讨论现代中国演说家们的理论与实践。不管是难得的孙中山演说留下的氛围记忆,还是梁启超乡音引发的啼笑皆非(梁启超倒认为梁启超的演说带着广东口音才够劲),或是宋教仁、闻一多那样因演说被难,还有陶行知与闻一多演说中迸发的诗性光辉,都紧扣印证着本书副题中的“演说的魅力及其可

名的演说家胡博士一本现场声音小集,想来也是抱憾抱憾。

诸君看过平原先生这本新著便知,所谓“有声的中国”,主要还是关注面向公众的演说。这事在传统中国是个“缺口”。现在我们去探讨古人“语言的政治”“说论的艺术”,大多以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为例,但那里面大多是数人之间的对话,很少有面向公众的演讲。有一个有关内部对话的故事,大家都喜欢讲,那是隋开皇初年,刘臻等八个人到陆法言家去讨论音韵问题,试图解决南北俗音方言歧异的问题。就是那天晚上,魏澹对陆法言说出了那句名言:“向来论难,疑处悉尽,何不随口记之!我辈数人,定则定矣。”于是中国目前可考最古的韵书《切韵》诞生了。古代文化史上,这样的事例很多。

在我们这样一个什么都讲流量的现代社会,追求“我辈数人,定则定矣”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因此政治也好,学术也罢,社会动员更是,都少不了向特定或不特定的多数公众演说的需求。梁启超说报章、学演、演说是“传播文明利器”,绝非虚言。我研究1904-1906年的北京启蒙运动,那时几乎每出大戏开场前,都会有彭翼仲、王子贞等人上台演说国家大义,平时也有志愿者(大多数是演说先生出身)在讲报馆宣讲报上的新闻与时评,最有名的醉郭,教师出地苍茫,无枝可依。加上博士论文答辩、找工作等等干扰,最终竟不能还著

念这把陪伴了自己艰难岁月的声音。再有“五四”时期的平民教育演讲团,每次出街之前,都将演讲题目登载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,内容无所不包,堪称当年的现场小红书。

诸君或许会觉得“声音”这个题目说起来很热闹,但你要具体下手试试,会发现内容极为琐碎,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声音文档留存(个别历史上的大人物除外),讲者的语气神态、节奏顿挫、现场气氛、事后影响,全需要从报章或回忆录中撮取。这份工夫不是轻易能做到的!当然,你若只是研究演讲文本,倒是方便,只是那就失去了研究“声音”的初衷——顺便说一下,研究案头文学的戏曲剧本,与关注演出现场的歌喉韵味,其间的差异也很类似。

让我们来看看陈平原积年之功,是怎么来探讨“有声的中国”这个想想都让人头疼的命题之:

第一章《演说之于现代中国》提纲挈领,极是简明地阐明“演说”这一外来事物如何在近代中国蔚然成风;我们这些人又如何在记录技术手段缺乏的前提下,靠对演说的“视觉呈现”与“听觉记忆”追摹现场——或用陈平原喜欢的“现代国话”的形成。如果说用一场演说来比方这本书,那这一章就是铺好舞台,摆好话筒,PPT列好提纲,灯光打好,话题渐渐入港。

第二章《晚清画报中的声音》其实是放大了“视觉呈现”,将作者关注的“图像”与“声音”勾连起来。这一章配的插图既多且妙,而且也不限于演说,举凡乐队、剧场、会议,晚清画报中出现的声音类型,纷纷跃然纸上。特殊演说者如小学生、和尚、道士演说的画面场景,特别能呈现晚清社会“众声喧哗”的特性。在一场演说里,这就是列数据、举例子的部分,丰富又有趣,观众自然舍不得离场。

第三章《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》,干货来了!作者过目的近代以“演说学”为主题的书籍多达56种。这些书籍或译或著,精粗不一,详略参差,但汇集起来,就很好地展示了现代中国人是如何追求演说的才能,以及什么样的演说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演说。同样,名人演讲集的盛行,也让人看到民众对“声音”(哪怕是拟想的)的迷恋。诸君,我突然想到,将中国古已有之的“语录”与20世纪的“演说”进行细析比较,怕不也是很好的跨学科题目?

第四章《声音的政治与美学》是最好看的,讨论现代中国演说家们的理论与实践。不管是难得的孙中山演说留下的氛围记忆,还是梁启超乡音引发的啼笑皆非(梁启超倒认为梁启超的演说带着广东口音才够劲),或是宋教仁、闻一多那样因演说被难,还有陶行知与闻一多演说中迸发的诗性光辉,都紧扣印证着本书副题中的“演说的魅力及其可

性”。演讲学书籍里常教导我们演说时要准备几个名人小故事,这里故事是最多的。

前面的章节都很精彩,但诸君若来问我,我最佩服的是第五章《徘徊口语与书面语之间——工作报告、专题演讲与典礼致辞》。如果前四章足以说明作者的体大思精,那么这一章呈现出的是作者直面当下的勇气与卓见。比起需要搜罗爬梳各类材料的近代研究,对当下发言,材料不缺,但笃实地评判好坏容易,直接辨析“为什么书面语会伪装成口语”“为什么口语会进入书面语”这样的问题则倍感艰难。前者指向“套话”对日常话语的渗透与同化,后者则以“根叔体”“淘宝体”进入殿堂为例,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态度,让人想起平原先生“中文系学系的就是优雅得体的表达”的断语。这些现象分析,背后的问题其实是“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”。比起文白分野初期“我手写我口”的激烈主张,作者显然更认同五四新文化人所追求的“有雅致的俗语文”。一本探讨“有声的中国”的学术著作,最后提出的问题是:“读书人还能发出独立的声音并讲求文章之美吗?”

诸君不觉得是这样吗?今日语言之难、之害,大概都在于太缺乏“独立的声音”,从